

本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佛教造像拓片整理工作簡報



北魏正光六年（525），賈智淵妻張寶珠造像拓片（原石藏山東省博物館）

顏娟英 謝振發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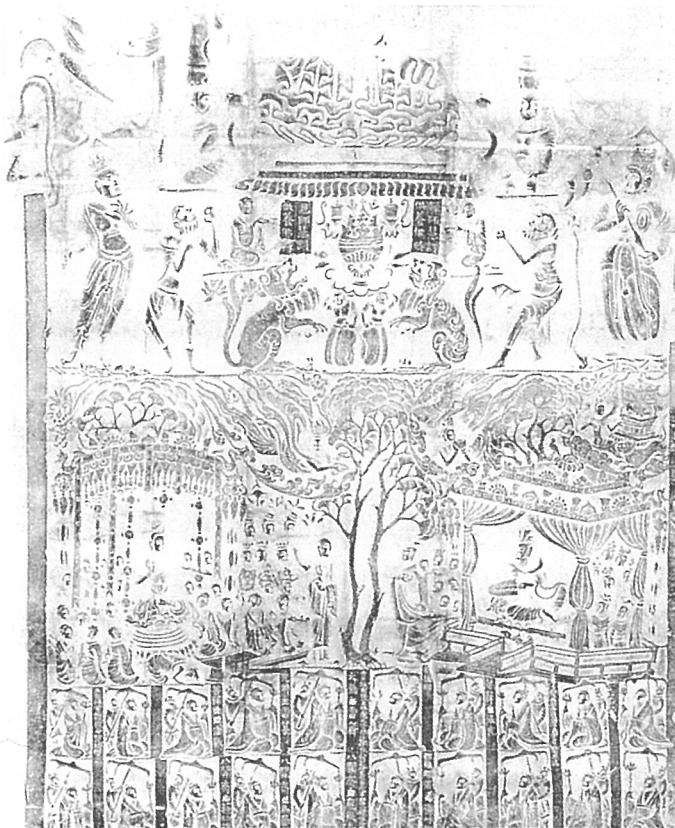
本所收藏佛教方面的金石拓片為數甚多，依內容可區分為造像及其題記、寺塔碑頌、佛名和刻經、陀羅尼經幢、僧尼的塔銘和墓誌、以及其他鐘、鑪題銘等類別。這些拓片以中國為主，始自西元五世紀初，迄於民國，此外也有少數是外國的造像拓片，如日本法隆寺金堂釋迦、藥師等造像記。從拓片上的收藏印章來看，有的原為桂馥、端方、周星詒、徐乃昌、柯昌泗、潘士魁、鄭玄、劉燕庭等人的舊藏，又以周、柯二氏為最；而（陝西）耀縣造像的部分則是本所石璋如先生田野調查時所購得的。這些金石拓片是我們探討中國佛教文化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。

清代金石著作中收錄佛教方面的金石資料極為豐富，使用相當便利，不過拓本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。金石著錄的來源大多也是根據拓本，拓片的來源很廣，很難蒐羅周遍，有的只備條目而無錄文，如本所收藏的孝昌三年（527）蔣伯仙造彌勒像、北齊皇建元年（560）□檀寺比丘法□造靈尊像並觀音經記、以及武平元年（570）劉氏宗人造寺等，諸多造像記目前尚未見載於過去的著錄中。上舉最後一例，劉氏宗人造寺記，記載從祖劉桀於北魏太延初年出使粟特，可補史書的闕漏。其次，各家的錄文因拓本傳搨粗劣，或因俗字、異字辨識有誤，釋文謬誤在所難免，因此仔細審讀拓本，校對著錄，實有其必要。

文物圖像研究室佛教拓片的整理工作自一九九七年初開始進行以來，一方面依紀年及無紀年朝代別編寫拓片總目，同時擇其重要者進行釋文，目前初步完成南北朝的部分，隋代紀年拓片也即將完成。釋文工作於隔週之星期二下午在圖書館拓片室進行。事先的準備工作包括篩選重覆件中的精品，並找出相關著錄以便於對照校釋。沒有著錄的拓片便事先作初步釋文。這些初步整理工作由負責人顏娟英和前後任研究助理賴依縵、謝振發、黃錦珍完成，釋文會讀工作的主要成員包括本所劉淑芬、柯嘉豪、蔡哲茂等先生，台灣大學周伯戡先生，故宮博物院李玉珉、陳蕙霞女士，圓光佛學院賴鵬舉先生等等。茲就本所的南北朝造像拓片的收藏，並配合陳列館新展品略述如下。

二

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，造像亦蔚為風潮。現存的佛教造像以北朝為大宗，南朝



東魏武定元年（543）禪師慧訓、慧剛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拓片（局部）（原石出土河南淇縣，大部會博物館藏）

寥寥無幾，因此本所的造像拓片也以北朝為主。就目前整理出的拓片來看，北朝紀年拓片有一千二百六十餘件，計六百餘種，而南朝拓片僅有二十九件，計十六種。

南朝拓片中，四川地區的造像有七種，參照清光緒八年（1882）和民國四二年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的數百件造像，顯見四川造像頗為發達。其中無量壽佛造像的拓片特別值得注意。即元嘉二十五年（448）□（高？）熊造□（無）亮佛相以及永明元年（483）西涼曹比丘釋玄嵩造無量壽及彌勒碑像，前者刻有始康郡晉豐縣，約當成

都附近，後者則是茂縣出土。而萬佛寺出土的元嘉二年（425）造像似表現西方極樂淨土，畫面中央刻有主尊佛及諸脇侍，兩側配置樓閣，四周圍繞蓮花池，以及在池中游泳的人物。還見另一件無紀年拓片也有類似的圖像。由此看來，四川地區無量壽佛的信仰似乎頗為發達。

北朝拓片除了寺塔、碑像之外，石窟造像約佔半數。北朝開鑿石窟的風氣特盛，一方面反映北朝佛教重禪修不同於南朝的義學佛教，另一方面也與帝都造像的傳統有關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記載和平元年（460）於京師平城西郊武周山開窟五所，這是北魏石窟的濫觴。此即今大同雲岡第十六至二十窟，是為北魏太祖等五帝祈福而開鑿的。遷都洛陽以後，宣武帝仿舊都雲岡石窟，於龍門為孝文帝后開窟二所，而北齊文宣帝則於鄆都鼓山開鑿響堂山石窟，這種在帝都開窟造像的風氣無疑是一脈相承的。

本所的北朝石窟造像拓片涵蓋甚廣，除了雲岡、龍門、響堂山外，還有遼寧義縣萬佛堂、河南鞏縣石窟、安陽寶山、甘肅涇川南石窟寺等，共有六百二十餘件，計二

百種。其中又以北魏龍門石窟佔絕大多數，近五百件，一百四十五種。北魏龍門石窟造像發達，造像記的數目也居全國之冠，這與佛教義學發展及孝文帝遷都洛陽積極漢化提振文風有關。而清末碑學興盛，龍門造像樸質的書風成為新風尚，也是促成龍門拓片廣為流傳的原因，從本所收藏的拓片鈐蓋販售店鋪章記可窺知箇中消息。不過，在東、西魏以降，龍門的拓片銳減，相對地造像碑拓片的數目甚多，和實際佛教造像的現象符合。

三

龍門石窟素以龍門二十品著稱於世，其中十九品皆出自古陽洞。新陳列室中今挑選出丘穆陵亮夫人尉遲氏、北海王元詳、比丘慧成、孫秋生等二百人、楊大眼、魏靈藏等六件造像拓片，一方面是展示北魏雄奇遒勁的書法風格，另一方面，透過這些造像記的內容及其分布在石窟中的相互關係，可以較深入地瞭解古陽洞的開鑿歷史情境。後四件拓片位於古陽洞南、北二壁的第一列龕，是古陽洞最先雕鑿的主要龕像，而前二件都是雕刻在魏靈藏造像上方的小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孫秋生和魏靈藏只是縣級功曹，但他們的造像卻位在主龕之列，而皇室和顯貴們的造像反倒刻在窟頂或下層不顯眼之處。太和十八年（494），孝文帝以南伐蕭逆為名而行遷都之實可能經過周詳的計議。故而洛州地方功曹積極地布署因應，相對地，習慣平城安逸生活的皇室或顯貴未必能坦然面對播遷，如元詳造像記所述，為祈求太妃高氏安返平城而發願造像，可以想見遷都時權貴們奔波往還平城和洛陽之間的情形。龍門承襲平城為帝王開窟造像的傳統。稍後景明初年，宣武帝也開鑿石窟為孝文帝后祈求冥福。

南石窟寺開鑿於甘肅涇川縣東涇河北岸的崖壁，是永平三年（510）涇州刺史奚康生所營造的。該窟四壁雕刻七佛和彌勒菩薩，像高六公尺，規模巨觀。從碑文篇幅多歌頌皇恩浩瀚看來，大概也是為國運而開窟造像。

除了石窟造像之外，獨立的造像碑也頗為盛行。北魏初期鮑纂造石浮圖像（442）及宋德興造釋迦文佛像記（457），呈現早期以釋迦信仰為中心的造塔及佛傳的潮流。晚期的張寶珠造像碑（525）原刻於山東益都，是張寶珠為七世父母等造像，碑側及碑陰並刻有千佛像。東魏武定元年（543）禪師慧訓、慧剛等造像碑，原石在河南淇縣，盜運出境時被截為兩段，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。圖像的內容甚為豐富，包括文殊問疾的維摩變及布施精義的須大拏太子本生等圖像，除了表現東魏巨碑式的造像形式外，內容上也表現出大乘佛教會通諸經的思想。